

山区校长违规使用义务教育资金 背后的隐痛

张文凌

位于云南省弥勒县西部高寒山区的西二镇，是一个经济贫困的乡镇，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1387元。这个镇几乎没有一块平地。记者在西二镇中学看到，除了一个不大的操场是平的，教学楼、宿舍楼、办公室全部顺山而建，上上下下都是坡。

不久前，云南省审计厅对红河和德宏两个州的12个县（市）2006年度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中免学杂费和补助公用经费的到位、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审计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其中西二镇中学“2006年从‘一免一补’经费中支出55位教职工到北京及华东5市学习考察费用12.31万元，占该校当年所得‘一免一补’资金的40%”。

西二镇中学校长张强说：“让老师们出去考察学习是我们校务会12个人集体决定的。对于审计结果，我会积极配合上级部门整改。检查已经写上去了，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不过我心里很坦然，毕竟让老师们出去开了一回眼界。”

2006年暑假里那一天的清晨，西二中50多名教职工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前看着国旗庄严升起。“太兴奋，太激动了。”数学老师董桂萍想用更多的词语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但想了半天没

想出来，然后说：“太震撼了！”虽然事情已过去一年多，但董桂萍一说起那次北京和华东5市之行，就一脸笑容。那是她第一次出省。他们去了清华大学、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30万死难同胞纪念馆”、上海香山中学等，拍了不少照片。一位语文老师说：“我把卢沟桥的石狮子用数码相机拍下来，回来上课时放给学生看，课一下子就生动起来，学生很受听。”

这次考察每个人花费3208元，除去个人承担600多元外，学校为55个教职工共承担12.31万元，费用从“一免一补”教师培训经费中支出。

2007年7月，根据云南省审计厅的审计结果，弥勒县财政局、弥勒县教育局联合发文，“对违规使用教师培训经费且违反财务规定拆分发票报销的学校校长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责令其改正”。11月21日，西二中55名教职工将学习考察费用全部如数退缴。

尽管有老师抱怨“为什么别人也有去的，我们一去就有问题”，但他们同时也认为，“交回去也没什么，反正这钱是自己用的”。

“老师们都很善良，这件事情后他们仍然一如既往，没有人消极怠工。”张强说。

弥勒县教育局局长李保生说：“财务和法律知识的欠缺，是造成西二中违规使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原因。”而对于有人提出对张强进行行政处分，李保生坚决不同意。他说：“那样做等于伤害了大量的农村学校的校长和老师。”

张强1992年从红河州师范学校毕业后到西二镇中学担任语文老师，从2004年起任该校校长。他上任后西二中中考成绩逐年上升，2007年中考成绩总分上500分的学生是弥勒7个乡镇中最多的。

作为教育局局长，李保生深知农村校长的艰难和教师生存状态差、生活质量低的现状。他的电脑里就有一份全县22所中小学“师生饮水困难情况登记表”。

在农村，大部分学校分布在山区和半山区，自然环境恶劣，交通闭塞，工作环境条件差。大山不仅阻隔了交通，更重要的是阻隔了教师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张强说，西二中从上个世纪建校以来，老师们就只去过一次省城昆明。他也是在2005年当上校长后由县里组织去了北京一趟，而在此前任教的12年里他从未离开过西二镇。“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

“都21世纪了,作为一个教师,还没出过县、出过省,怎么给学生讲课!”张强说,长期在山区,老师们信息不灵,无法及时获得新知识,观念落伍,眼界狭隘。随着城乡差距的加大,农村教师的整体素质如果得不到提高,农村中学的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的提高将会面临着很大的瓶颈。”

张强的这种担忧,正是目前农村义务教育遇到的困境。李保生说:“即使是在农村,人们也想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如果乡镇中学的教学质量不好,很多人就会想办法找关系到县上去读中学。每年秋季招生时都是县属中学校长最头痛的时候,也是我这个局长最头痛的时候,来找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们有规定,教育局任何人不得向各个学校的校长打招呼。”

云南省人大代表、昆明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与发展研究室主任谢家放也在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70%的人口在农村,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点也在农村。但是不能不看到,农村教育无论在教育理念、教师队伍、课程资源、文化素养等方面都还很落后。”分析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学质量低下的原因,谢家放认为,主要

是农村教师的整体素质不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绝大多数是在传统教育的模式下培养出来的,由于长期置身考试教育的包围中,缺乏定期的脱产培训制度,加上长期超负荷运转,使教师个人素质的提高受到限制和影响。他曾经做过的一个调查显示:近70%的农村中小学教师与城市及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中间存在壁垒。

云南省思茅市景东县教育局副局长李卓娟对此深有感受,她说:“农村教师培训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她指出,根据2006年下发的《云南省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管理暂行办法》,“教师培训费按照学校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5%安排”的规定,在一些财政收不抵支的县根本无法落实,就算是能够落实的学校,“5%的安排”也不能满足几个教师的培训。即使现在提高到了10%,也仍然是捉襟见肘。

李卓娟说:“我曾经带着20个校长去上海培训,那是上海方面给我们的一个扶贫项目,每人的平均费用为1万多元,由对方全额承担。如果没有这样的项目,我们根本出不去。”当时李卓娟还是景东县第一中学的副校

长,那是她工作了15年后第一次到省外学习。20个校长中,大部分也都是第一次出去。李卓娟说:“培训成本太高了。让教师走出去接受培训难,请专家来学校培训也难。现在一个专家一小时讲课费三四千元,学校无力承担这些费用。”

记者了解到,目前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培训工作主要是在市里和县里进行,由当地的师范专科学校承担培训任务,这些搞教师培训的教师大多是从学校骨干教师中选拔出来的,基本上是教师中的佼佼者,但许多教师反映“培训者水平不高”、“例行公事,针对性不强”、“脱离实际,难以应用”。

“这种封闭的、内循环状态的市县级层面教师培训工作基本流于形式,达不到培训效果。”谢家放说。

云南省青少年基金会2007年在调研中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他们在《云南希望工程需求与深化拓展调研报告》中说:“中小学教师‘近亲繁殖’现象严重,教育观念模式化,教师州、县际流动少,形成思维定势。”针对这一情况,2007年云南青基会在临沧、昭通、楚雄开展了“希望工程送教上门”活动,邀请国内知名教师对当地教师进行培训,活动在农村教师中引起的反响出人意料,当第三次在楚雄举行时,没有分配到免费名额的各县教师自费前来听课,把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名师授课让听课者惊喜不已,有的甚至泪流满面。一位教师说:“教了10多年的书,还不知道枯燥的课能这样生动地讲。”

无论是去北京、上海还是接受“希望工程送教上门”的培训,教师们都把这种培训称为“经历了一次洗脑风暴”。他们甚至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我们无法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原载《中国青年报》2008年3月24日)

